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革命节日

〔法〕莫娜·奥祖夫 著



汉译世界学术

革 命 节 日

〔法〕莫娜·奥祖夫 著

刘北成 译



商 務 印 書 館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节日/(法)奥祖夫著;刘北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8761-2

I. ①革… II. ①奥…②刘… III. ①法国大革命—
研究 IV. ①K565.4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605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革 命 节 日

〔法〕莫娜·奥祖夫 著

刘北成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761-2

2012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1/4 插页 5

定价: 32.00 元

Mona Ozouf

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 1789 — 1799

© Éditions Gallimard, 1976

根据伽利玛出版社 1976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1 年已先后分十二辑印行名著 50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三辑。到 2012 年出版至 55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2 年 1 月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1
导论.....	8
第一章 革命节日的史学研究	26
革命作为节日	28
节日的历史,派别的历史.....	38
郁闷和恶心	46
第二章 联盟节:模式与实际.....	54
骚乱与节日:狂野的联盟活动.....	60
联欢节	63
巴黎的联盟节	68
一个新的节日?	76
全体法国人的节日?	82
第三章 超越党派的节日(1792 年)	93
常规和例外	94
两个对立的节日?	100
悲剧的统一.....	116

第四章 戏弄与革命(1793—1794 年)	122
另一种节日	124
何时,何地,和谁?	133
合理的理性	140
暴力和节日	149
第五章 回归启蒙(1794—1799 年)	153
“幸福的民族”	160
共和 4 年雾月体系	170
第六章 节日与空间	182
无质量的空间	183
象征性标记	192
仪式空间的革新:卡昂的例子	198
巴黎的抵制	212
大革命的时空	220
第七章 节日与时间	227
开端	229
切分	232
纪念	239
结束	268
第八章 节日的未来:节日与教育	281
“成年人的学校”	282
形象的力量	288
形象的正确使用	292
没有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303

第九章 民众生活与革命节日	311
糟糕的民俗调研	312
失败的历史	321
革命象征主义和农民传统	333
野生的五月柱	335
教育树	350
从五月柱到树	360
断裂	368
第十章 革命节日:神圣的转移	376
对空虚的恐惧	382
借鉴的含义	388
删减的意义	398
参考文献	405
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共和历法	436
译者后记	438

中译本前言*

《革命节日》、《女人的言辞》、《小说的见证》是这个中文版收集的三部著作。表面上看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联。第一部论述自 1789 年起的那 10 年和革命事件；第二部描述了自 18 世纪到当代的一些女性形象，这些妇女的身份、抱负和成就各不相同；第三部专注于 19 世纪，分析了代表法国文学的几部小说。因此，这三部著作考察的年代不同，研究的对象不一致，研究的方法也各异——从历史学到集体心理学再到文学分析。更有甚者，在第一部和其他两部之间，我们甚至还能察觉到一种“对立”。《革命节日》强调的是关于整合法兰西的意志主义教育法。其他两部讲述的是对这种整合的抵抗以及呈现多样性的途径：或者是性别的多样性，或者是小说情节的无限多变性。

尽管如此，在我看来，我们可以为这三部著作主题之间的联系以及把这三部著作放在一起译成中文的内在逻辑加以辩护。因为三部著作都是围绕着什么构成了法兰西特性这个问题进行的思考。

* 该中译本前言是作者奥祖夫为其即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三部作品《革命节日》、《女人的言辞》和《小说的见证》而作。——译者

首先,我们来看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革命节日》。大革命显然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在国外,谈起“革命”这个词就必然想到法国。当然,有人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说其他国家也如我们一样发生过革命:这里说到的是美国革命。美国革命也肯定了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它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拟定了一份人权宣言,主张保护公民,反对任何损害他们自由的行为。由于两个民族受到的束缚不同,这两个事件呈现出了非常不同的特点。美国人的根本目标是与远方的宗主国决裂,并以英国人的自由传统的名义举行反叛。法国人则是在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内进行斗争,要与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老的君主政体决裂,并反对它的传统。他们的的确确希望恢复人的原始目标。与美国人的事业相比,这项事业张扬了一种唯意志论和一种激进观念;时至今日,这两点还是法国人性格的显著特征。

我们脑子里必须存有这样一个问题,法国人从抛弃国家的拱顶石——国王的人身——之时就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了。君主制秩序的根基是拟人化的,体现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共和国”则是用抽象观念打造的。后者的精髓在于用某些理念而不是用某些人来描述和代表法兰西。因此,她必须假定和主张共和国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以便让人们忘记被她砍去头颅的国王,并且与曾经被国王代表的统一体竞争。正因为如此,革命者如此热衷于领土的统一,方言的统一,最终是世界的统一,以至于他们主张法兰西具有一种普世的使命,相信她有能力为全人类立法,而不管构成人类的具体人群的特性。

总之,这是一个完全反对特殊性的革命方案。先看看他们的

时间设计：革命者确信可以用一个自由的共和元年作为开端，重新开创人类的历史；他们相信可以重建历法，取消礼拜日，废除地方性的旧圣徒，崇拜抽象的神灵诸如理性女神。再看看他们的空间设计：他们想合理地组织空间，清洗掉过去的印记，让按几何学设计的城市拔地而起，推倒钟楼，让垂直的钟楼不再凌辱住宅的平等。再看看他们的教育设计：他们希望为那些一直被视为荒唐混乱的人际关系提供一些固定模式，为成人设计一套公民教育。简言之，他们有一套全盘掌控社会的方案。

正是在这种总体性的教育蓝图中设计了革命节庆。在革命者创造一套节庆体制的计划中包含着某种吊诡的东西。这些人正忙于应付内战和对外战争，很显然，在倾注精力组织复杂的节庆外，他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但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测，他们都对刚刚完成的决裂心存隐隐的恐慌，都有一种对空虚的恐慌。他们觉得，没有了旧仪式，人们的生存丧失了意义。既然拒绝委托一个人来做权力的化身，就更应该考虑设计一套体现团结一致的剧目。

因此，革命者寄希望于节日发明一些交流手段，传递给所有法国人一些感受和一些统一、共同的情感。正因为如此，他们念念不忘地希望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节庆，处心积虑地想让节庆在一年内有规律地举行，并持续下去。借助于与旧制度的节庆截然不同的革命节庆，革命者希望强化一种情感，即法国是由一块单一的、相同的材料制成的。他们认为节庆是儿童学校向成年人的延伸。他们把节庆定义为“成人的学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这种把学校变成建构民族统一性的核心的法国特性。

这个系列的第二部著作《女人的言辞》探讨了女人在法国社会

中的地位 and 角色。为什么挑选女人的角色作为法兰西特性的象征呢？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尽皆知的事情说起。在 18、19 世纪，所有来法国的外国旅行者都对法国女性扮演的角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注意到，我们心甘情愿地赋予女人维系家庭关系、礼尚往来和交谈的职责：她们在私人领域的权威是无可争辩的。此外，在女性不参与社会事务的年代，法国妇女要比其他欧洲国家妇女更多地所有社会场合现身，具有一种权威和引人注目的社会能见度。至于我，在思考女性主义在法国社会的地位时，我同样看到一种民族特性的呈现。除了一些例外，法国女性主义并不具有侵略性，它并没有采用其他国家（特别是北美）女性主义激烈、僵硬的论调。这是一种温和的女性主义，至少它迟迟没有确定它的征服领域，只满足于考虑得到投票权。这种腼腆从何而来？为何极端女性主义的言论在法国获得的响应如此之少？

由此，我有了一个想法，要让人们倾听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 10 位法国女性的声音。尽管这些女人彼此之间差异很大，但她们都思考爱情、女性状况、婚姻、母性、男女关系以及人生中的良机与厄运。无疑，她们是根据她们千差万别的人生道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构思这些问题的。但在我看来，某种深层的东西将她们连在一起：对少女教育的重视，学习的热情，对传达感情的兴致，对男女之间可进行愉快交往的信念。

对这些女性声音的考察让我相信，在我们国家有一种十分独特的、同时感受到差异和平等的方式，这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诸如，长期存在的男女交往的习惯，互相诱惑的习俗，对文雅和品行的信心，共和体制中贵族风范的复兴，这最后一点正是我的一个肖

像人物斯塔尔夫人为之辩护的。这里,我发现了法国人的一种倾向,即对社群主义的坚决抵制:这是一种别出心裁的结合,一方面是对开创两性快乐关系的贵族社会的怀念,另一方面是对平等观念毫无限制的民主社会的现实。这就导致了一个特殊的社会。在这里,平等的诉求是最根本的,但又强调差异的价值;通过利用诱惑的资源 and 暧昧的情爱关系,也就是说,通过弹击无穷无尽的浪漫键盘,人们可以摆脱忧虑,享受快乐。

这个键盘正是我在第三部著作《小说的见证》中着手探讨的。可以说,文学是法国人的又一特性,因为法国自黎塞留的时代起就看重文学与国家的联姻。因此,我的这部著作对19世纪小说做了一番巡礼。革命的动荡实际上开启了一个矛盾而错综复杂的世纪,它既放眼未来,又着迷于回归,既仿效古老的君主制,又反复叨念大革命;从此以后,它既前所未有的地命令年轻人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命运,但又一点也没有少加给他们回忆、习俗、社会和道德常规的重负;最终,使年轻人在对待他们刚经历过那场大变动的不同方式上摇摆不定:是否定它,拒绝它,接受它,拥护它,还是仅仅去理解它?他们是否应该和自由主义者一起庆祝1789年,谴责1793年?还是和社会主义者一起庆祝1793年,否认1789年?我们应该忘记大革命,结束它,还是重新再来一次,或是把它推进?这种困惑有时在同一群人中间引起了矛盾的反应,也在这个世纪里诱发了无数次的和解:一些和解是众望所归,一些和解遭到愤怒的拒绝,还有一些和解则是人们在屈服与厌恶中达成的。

小说本身是一种复合文体:从它包容一切的癖好上说,它具有民主特性,从它对形式的趣味来看,它又具有贵族气质,它见证了

人类的差异,口味和兴趣的繁杂;因此,它尤其适合阐释时代的变迁。19世纪小说“见证”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总是积极而有声有色地存在着。但同时在新法国,仍然维持了上个世纪的风俗习惯,宗教慰藉,对文学的尊敬,女性的慈善角色——她们是家庭领域的统治者,道德的捍卫者,举止风范的教育者、调停者和教化者。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了民族的特性: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尽管存在革命极端主义,它仍然知道从它的传统中吸取用以隐蔽和庇护的东西,以对抗民主方式的粗暴。

革命,女性,文学。三个主题、三本书放在一起,可以让读者更清楚地理解,我长期探讨的问题是,自法国大革命这一基本事件以来民族特性是如何建构的。在革命节日这个个案里,人们是通过革命者的意志主义教育学,通过消除相异事物的热火朝天的事业来进行这种建构。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人们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抵制这种事业来从事这种建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妇女或文学所扮演的角色:二者体现的不再仅仅是统一,而是多样性。

这三部著作展示了我的研究工作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致力于理解为全人类寻求普世和抽象原则的动力——这也是法国大革命的邀约——是如何在一个纷繁复杂、邪恶横行的世界里建立民主的承诺。另一方面是致力于理解这种动力如何使人们发现一种文明的明显特征,用普世的启示来评价它的价值、魅力、潜在的精力以及抵抗能力。这两方面关系紧密,相辅相成。

三部曲的第一部《革命节日》探讨的正是普世性这一面。创建一个崭新的节庆体制对革命者而言既有必要,也颇多争议。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要展示新政权。之所以有争议,则是因为关于革命

节庆的研究揭示出这一事业所面临的众多困难。首先是审美上的困难,因为在那样一个时代,仪式越来越被看做是一种惯例,君主庄重的典礼被看做是幻象。因此,应该给人民提供关于它的另一种表象,结果,革命节庆的舞台装置注定是贫乏的。其次是历史过程的困难,因为大革命几乎不能在一个统一的仪式中庆祝它自己的历史,它充满着矛盾:那些大人物相互残杀,不同的阶段相互否定。最后是形而上的困难,因为超验性被驱逐出仪式:人们不再援引神圣的事物,被颂扬的崇高完全是一种人世间的崇高,不朽只是在人们的记忆中存在。因此,这部著作描写的是一个悲怆的事业:它对于保证民族统一极为迫切,而又令人绝望。

莫娜·奥祖夫

2009年

导 论

我们现在常常感叹说,再也没有什么节日了。18世纪人们也是如此感叹。关于节日的抱怨持续不断,而且异口同声,以至于节日类型学让人觉得是无稽之谈。然而,实际上却有着一个接一个的节日。有皇家的节日、行会的节日、宗教的节日以及民间的节日,林林总总,各式各样,让人有点不敢使用单数名称的“传统节日”。如果有人偶尔为之,那也把它当做贬低所有节日的集合词。传统节日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概念,是“开明人士”昧于理解的产物,他们——就像我们一样——确信真正的节庆欢乐已成往事。

然而,如果说那时人们认为再也领略不到真正的节庆了,那是因为太多的节日。导致人们如此诉苦的原因是节日太多——不像如今这样节日太少。尼古拉·德·拉马雷*告诉我们,巴黎就有32个节日,这还没算上每年的52个礼拜日。数量如此之多,使那些削减的尝试都显得太缩手缩脚了。“精简”的口号响彻了整个世纪,最终被记录在陈情书**中。这种要求的背后是对经济效率

* 拉马雷(Nicolas de La Mare, 1639—1723),法国官员,著有《治安论》。——译者

** 陈情书(cahiers de doléances),1788年,路易十六召集三级会议时,各地呈交的情愿书。——译者

的关切。首当其冲的谴责对象就是没完没了的节庆：宫廷节庆、学 8
校节庆、校长仪仗游行，工匠和技工的游行，这一切都出自同一根源：“我们的懒惰本性”。^①正是这一点启发了人们对国家收入损失的（常常很具体的）计算，孟德斯鸠就曾做过类似的计算。新教至少每年能增加 50 个工作日。“新教商业”在竞争中胜过“天主教商业”^②，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种看法激发了一大批方案，人们建议把放假的节日移到最近的礼拜日，甚至在礼拜日上午的弥撒和布道之后允许工作。^③这就可以让劳动和做买卖各得其所，让人们手执镰刀向上帝礼拜。虽然这可能会得罪几个圣徒：这个风险在雅各宾派发狂之前，在夏尔·维莱特胆敢断言圣徒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格格不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④

此外，辛勤忙碌乃“纯真之母”。圣皮埃尔修道院院长的这句格言在这整个世纪被反复提及，以致让人都感到厌烦了。它被用于支持让主日的时间远离酒馆、赌博、女人和无聊竞赛的主张。与痛恨浪费如影相随的，是对节日本身带来的放荡不羁的担心。经 9
济上的合理性在这里与道德和宗教教义不谋而合，因为“虔敬的圣日”在实践中已经变成了酗酒、放荡、斗殴、甚至凶杀的时机。在节

① 法盖(Faiguet de Villeneuve):《穷人之友》，巴黎，1776 年。

②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日内瓦，1748 年。（见第 24 章，第 23 节。——译者）

③ 圣皮埃尔修道院院长：“如果当第一批关于劳动间歇的教规确立时，制定它们的主教们看到酒馆和赌场应运而生，如果他们预见到游惰和日常繁忙的间断会引起这一切混乱，他们就会只让自己望弥撒和出席早上的布道了。”（《政治著作》，鹿特丹，1734 年）

④ 维莱特侯爵(Marquis de Villete):《关于大革命主要事件的书信选》，巴黎，1792 年。